

《說文解字》在古文字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

張 舜 徽

近年來有不少的人，把《說文解字》和“古文字學”對立起來。認為《說文解字》中所收錄的九千多字，以小篆為主，只能代表秦代統一文字以後的字形，而不能用以上衡遠古；離開甲骨文字、銅器刻辭的字體太遙遠了。所以研究《說文解字》的，只能說是“《說文解字》之學”，而不能將它列入“古文字學”的範疇。這種看法，顯然是很不恰當的。

首先，我們知道秦代小篆的出現，是對大篆字形的一種改革。大篆筆畫較繁，字形重疊，書寫煩難。小篆便適應時代需要，把它簡化起來，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。假若遇到遠古文字中形體本來很簡單的，也就仍而不改。我們今天看到保存在《說文解字》的九千多字中，有些字形和甲骨文字，銅器刻辭中的字形完全一樣，說明了這種字形是遠古就已有了的，小篆仍用其體而不變。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《說文解字》中篆文下注明“古文某”，“籀文某”的，只是少數；大多數沒有注明的，除了有一部分後起字外，還有較多的字，古文、籀文與小篆同形，這裏面便包含了許多古文字。當日就許慎一個人所能見到的古代文字，下逮秦漢流行的文字，他都甄采了不少。可以肯定：《說文解字》一書，實集當時古今文字之大成。何能把“《說文解字》之學”摒除在“古文字學”之外呢？

衆所周知，要了解中國的古代文化，不認識古代文字是不行的。必須對《說文解字》有些素養，對漢以前文字的結構和本義有個初步了解，掌握一些規律性的基本知識，對於審辨遠古遺文，知道某文的筆劃由何而來，由何而變，以取得比較正確的判斷，才有可能認識甲骨和銅器上面的刻辭，以及秦漢時代許多篆書的石刻和器物的銘文。沒有《說文解字》作依據，即使新近又發現了成堆的龜甲獸骨和成批的青銅器，上面都刻滿了文字，也無法對那些古體字的結構進行剖析，而有把握地定為這是一個什麼字，那是一個什麼字，更談不上進一步作出翔實的考證了。所以這部書，一直到現在，還是一部極其重要的古代字書，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字必須由此入門的基本讀物。

當然，遠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許慎，為個人見聞所限，為時代條件所限，對於古文字的理解和說明，不可能沒有臆斷和錯誤。後人根據晚出材料加以補苴訂正，這是完全必要的。但初學尚不易談到這點，還是平心靜氣，系統地精讀這部書以後，才有可能進一步做工作。談到做學問，絕沒有平易的捷徑可走。必須不畏艱苦，按部就班地循序漸

進，把基礎打好，而關鍵在能讀常見書。在研究“古文字學”的領域內，《說文解字》便是一部首先必讀的常見書，凡是有志研究“古文字學”的人，有必要通貫它和精熟它。

從清末到現在，百年之中，在“古文字學”研究工作方面取得成績較大的，像吳大澂、孫詒讓的研究金文，羅振玉、王國維的研究甲骨，都是創闢新徑，前無古人。而他們成功的最大原因，便在於通貫羣書，湛深許學。一部《說文解字》，爛熟於胸，取材既左右逢原，檢字也毫不費力。正足以說明他們的基本功做的很堅實，才有可能在研究工作中出色地取得新的精闢的成果。這一事實，也足以說明《說文解字》在“古文字學”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了。

考證之學，後勝於前，這是事物發展的通例。由於時代的進步，一切事物都有了新的發展情況。就研究古代文字而論，前人所沒有看到的地下出土的古代遺物，日益豐富，無論甲骨文字、銅器刻辭、帛書、竹簡，都超過了往古若干倍，至於拓印的方法，影照的技術，也在日新又新。每有一種新材料出現，便馬上可傳佈於世，展開新的研究工作，從而可以取得新的成就，在“古文字學”研究領域內，也就蓬勃發展，後來居上。這是時代替我們提供了許多好的條件以後，才有可能在研究工作上做出較好成績來。這些有利條件，是前人所夢想不到的；所以我們今天做出的成績能夠超過前人，是完全應該的，值不得什麼驕矜和奇怪。

並世學人，精深研究古文字學的專家不算太少。就我過去所熟識的專家來說，如長沙楊遇夫（樹達）先生，是我早年常從往來論學、請益的前輩學者，每次到他家裏，親眼看到他摩挲《說文》，手不釋卷。特別是他晚年研究金文、甲文，所撰論文，日益繁夥，幾乎沒有一篇不廣徵《說文》用以考證遠古奇字。在他所著《積微居金文說》中《新識字之由來》一文中，將考釋文字的方法歸納為十四條，第一條便是“據《說文》釋字”，意味着離開《說文解字》便無由進行釋字工作，這自然是他一生研究古文字學的經驗總結，值得我們重視。

其次，如秀水唐立庵（蘭）先生，也是和我討論學術。過從較密的熟人。回憶他每次談到近人研究金文甲骨的風尚和得失利病時，總是笑人“《說文》不熟”，或者說“常見書讀少了”。在他早年所寫《古文字學導論》中，對怎樣去認識古文字，提出了四種方法：即“對照法”、“推勘法”、“偏旁的分析”和“歷史的考證”。在《對照法》中說過：“一直到現在，我們遇見一個新發現的古文字，第一步就得查《說文》，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續。”在《偏旁的分析》中又着重指出，在甲骨文字的研究盛行後，大都用的是猜謎法，因而古文字學暫時呈露出退化的現象”。他在這裏提出了“猜謎法”來諷刺那些響壁虛造的先生們，語重心長，不能算是過火的指責。在古文字學研究領域內，確實存在着不少用猜謎法來進行工作的人，所以參加研究工作的人雖多，但得出的結論並不那樣準確，取得的成績並不那樣顯著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

但是，事物總是不斷前進的。我們今天做學問，特別是研究古文字，再也不能像過去封建學者們抱殘守缺、拘守《說文》；也不必推尊這部書到無比的高度。像乾嘉學者段玉裁在《說文解字注》中稱頌它道：

此前古未有之書，許君之所獨創。若網在綱，如裘挈領；討原以納流，執要以說詳。

與《史籀篇》、《倉頡篇》、《凡將篇》亂雜無章之體例，不可以道里計。

其次如王鳴盛在《說文解字正義序》中也說：

《說文》爲天下第一種書。讀遍天下書，不讀《說文》，猶不讀也；但能通《說文》，餘書皆未讀，不可謂非通儒也。”

這一類頌揚它的話，都未免有些太過。我們今天的學術工作者需要接觸的面，比前人寬廣多了；需要閱讀的書，比過去更加豐富了；當然不能局限於這一部書的鑽研，況且《說文解字》的出現，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前有所承，陸續發展而成的。拿他的體例來說，許氏在《敘篇》中着重指出：“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廁”；又說：“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同條牽屬，共理相貫，雜而不越，據形系聯”。這幾句話，可說是已將這一著作分部收字的體例，高度概括地說得很清楚。但是探溯其原，在它以前的歌訣體字書，如今天還保存完整的西漢元帝時史游所作的《急就篇》，便已開創了這一體例，史游在《急就篇》開始便說：“急就奇觚與衆異，羅列諸物名姓字，分別部居不雜廁”。這差不多揭示了全書的體例。所謂“急就奇觚與衆異”，是說他的這一寫作和其他歌括體字書是不同的；下兩句又說明此書羅列物名、姓字很多，但又以次相從，把那些繁雜事物分門別類地敘述下來。我們檢覽全書，事實也正是這樣，它首先臚列一百三十二個姓字以後，便說：“姓名訖，請言物”。下面即用七字一句的韻語，將有關錦繡、染色、絲帛、稻粱、蔬醬、黑餌、衣襦、鍼縷、履屨、金屬、器用、竹木、魚鰕、席帳、飾物、珠玉、樂器、膾炙、酒釀、人體、弓矛、車輿、轡勒、房屋、農具、六畜、鳥獸、疾病、醫藥、喪祭等類常見事物，將偏旁相同的字羣類列起來，可以說是後來字書據形系聯、分部收字的先驅，毫無疑問，生在史游以後一百幾十年的許慎，是從這裏而得到了重大啓示的。本來，史游最初提出“分別部居不雜廁”，許慎也跟着說：“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廁”。一脈相承，更是一個明證。

至於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，內容至爲豐富。也確實如他的兒子許沖在《上表》中所指出的：

六藝羣書之詁，皆訓其意；而天地、鬼神、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蟲蟲、雜物、奇怪，王制、禮儀、世間萬事，莫不畢載。

但是這些材料，來源很廣，分載在經傳、諸子、字書、漢賦中，以及博訪通人旁涉當時流行的文字，都是他左右采獲的源泉。他不過按部類收錄，把古今文字條理化、系統化罷了。然而有了這部書，古代漢字才有系統，條理可尋；替中國文字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，給後世編纂字書，立下了明確的規範。這部書在中國文化史上作出了偉大的貢獻，佔據了重要的地位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。所以我們今天還有必要把它看成研究古文字學的基本讀物加以重視，認真地通貫它和精熟它。